

##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征文

##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抢占先机

约翰·罗斯

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取得了历史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未曾实现的成就——成为一系列重要行业和领域的技术引领者。此前，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实现了经济上量的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并没有全球技术引领性。如今的中国已在电动汽车、无人机、太阳能、风能、消费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领域取得技术领先优势。这些行业不仅对当下至关重要，而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例如，全世界都在向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交通领域转型，着力替代化石能源，这一转型将持续数十年。

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者，这必然会改变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国占据技术领导地位的行业和领域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意味着中国不再仅仅提供可在别国生产的中等技术产品，而且生产其他供应国无法替代的关键基础设施产品和部件。这使得强调对外开放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

这一无与伦比的成就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引领下取得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和世界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主席强调，“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既包括特定国家的实际情况，也包括特定发展阶段和具体问题。中国的国家特征包括庞大人口规模、悠久的历史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重点围绕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展开分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几乎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最低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已实现跻身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的伟大跨越。这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面临一项前所未有的任务：如何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

客观而言，这样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国明确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要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不仅要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回应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等具体问题，更要对整个发展阶段进行系统性把握，这正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优

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涵盖众多专业化生产单位，并将科学技术与直接生产深度融合的大规模生产形式。通常情况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哪怕是最具规模的生产活动也归私人所有，缺乏协调机制来确保不同生产部门能够实现有效的一体化发展。唯一的例外，是在类似二战期间这样的国家紧急状态下，由政府对关键经济部门实施直接管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依赖“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转。

这一点从当今的美国就可以看出来。

例如，在人工智能这一关键领域，个别大公司试图建立排他性的大型垄断，这不仅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未能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需的庞大电力供应进行统筹规划。

又如，美国曾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技术领先优势，但由于石油等化石燃料生产商通过系统性游说与行动，极力阻挠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以维护其在油气领域的高额利润，这一领先优势最终完全丧失。

结果就是，如今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几乎无足轻重，已将领先地位拱手让予中国，自身则深陷于污染严重、成本高昂的化石能源依赖之中，而在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持续低于化石能源。

相比之下，中国的优势在于既发挥政府作用，也发挥市场作用，既用“看得见的手”，

也用“看不见的手”。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

先进的生产，是涉及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复杂协作过程，这些人不仅参与产品的直接研发和制造，也深入到支撑这些产品的科技创新探索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实践，在其科学指引下，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得以实现有机整合。

中国从技术追随者转变为技术引领者，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向科技领域投入了巨大的资源。

对科技和生产一体化的重视，是中国能够实现技术引领这一历史性突破的首要原因。

就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而言，中国已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数据，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58%，约为排名第二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的两倍。

更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的这一比重也超过了七国集团(G7)

中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三个发达经济体。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4月30日在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在新能源等承载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的研发与创新成果，能够更快地转化为实际产品，这在绿色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表现尤为显著。

这一过程与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密切相关。习近平主席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正如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指出的，绿色发展是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是用最少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展，是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民共识。

以可再生能源为例，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一直依赖化石能源，最初是煤炭，随后是石油和天然气，电力等二次能源也多以此为基础。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如今已经明确揭示的事实：若继续依赖化石能源，随着大气中碳含量的不断累积，地球将面临生态灾难。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延续两个多世纪的能源体系，必须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在实践中，中国将科学、技术与制造能力有机结合，为实现这一转型作出贡献。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革命的引领者，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新能源装机规模连续多年居全球第一，并形成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同时，中国推动科技与生产融合，不断降低能源价格和成本。正是由于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扩大产能并利用规模优势，推动了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

可再生能源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但绝非孤例。中国取得技术领先地位，意味着其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提供高技术附加值产品。

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实践，同时也为世界带来启示。正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才能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抢占先机。中国的发展进程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是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深刻洞察与系统总结。其基本分析逻辑与理论框架具有普适性，值得每一个国家学习借鉴。其他国家虽不能照搬中国模式，但可以从中汲取经验与启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气候治理虽然历经风雨，但绿色低碳发展终成时代潮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求“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这既是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战略擘画，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体现了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深切考量。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处在关键时刻。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趋严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全球应对此类事件的紧迫性持续上升。同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气候议程受到干扰，个别发达国家的气候政策出现摇摆和倒退，损害了全球气候合作的政治基础，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出现“信心赤字”与“行动赤字”，气候治理面临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重塑信心、凝聚共识成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迫切需要。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动摇，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合作的立场一以贯之。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挑战与国际形势变化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始终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了中国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强调：“这是中国对照《巴黎协定》要求、体现最大努力制定的目标。完成这一目标，需要中国自身付出艰苦努力，也需要有利和开放的国际环境。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兑现承诺。”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和担当，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从积极参与者、重要贡献者到关键引领者的转变。

在宏观减排层面，首次提出覆盖全经济范围、包括所有温室气体的绝对量减排目标，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实现碳达峰，而且在碳达峰后还将持续推动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在能源结构优化层面，描绘了未来中国能源体系的蓝图，这不仅是能源供给侧的一场深刻革命，也将牵引能源消费侧的能效提升和电气化改造，有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广阔空间。在生态系统碳汇层面，更好发挥森林的碳库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紧密结合，体现了减排与增加碳汇协同推进的系统思维。在重点领域转型层面，夯实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带动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发展，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在市场机制建设层面，强调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减排目标，有效激励企业节能减排和绿色技术创新，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在社会民生层面，提出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策。

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提出，建立在过去多年来绿色发展取得坚实成就的基础之上。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新能源产业具备良好发展基础并形成强大国际竞争力。这些成就证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够实现协同共赢。中国的成功实践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强大信心与不竭动力。但也要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深化国际合作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之举。需继续在平等的国际合作与务实的共同行动之中，充分发挥中国的积极引领作用。

一方面，积极与发达国家探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解决之道，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携手应对，共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加大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立南南合作机制等，充分运用援建低碳示范项目、分享气象监测数据等方式，帮助其解决资金、技术等困难，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合作，继续为全球市场提供大规模、高质量的绿色产品和技术，并确保绿色产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与高效配置，维护好全球绿色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稳定、安全，为全球加速绿色转型提供支撑。

【作者系青海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副校长】

本版编辑 裴文美 编 高妍

## 人文经济学的丰富内涵与时代关切

杨玉珍

经济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深深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深受国家文化影响。这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必须具有一定文化属性。西方经济学基于稀缺问题，致力于研究如何进行有效选择和最优决策，以增进个人、家庭、企业或国家财富。而“经济”一词在中国与“经世济民”“经邦济世”相关，有着浓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逐渐形成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人文支撑，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成果。

## 坚持经济与文化交融互动

人文经济学坚持经济与文化交融互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促的理念，重点关注人、文化、经济之间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推进。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习近平同志曾深刻指出，文化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围绕文化与经济互动，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的主体——人作为载体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受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在讨论经济增长时，过去有些人重点关注资本、劳动、技术、制度等要素，文化因素被忽略或未受到充分重视。中国的人文经济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属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世界文明史上，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中华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财富观、竞争观、道德观、家庭观。例如，西方的契约理论不完全适应中国的人文经济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契约背后的责任和义务，内嵌于

社会关系和群体期待之中，贯穿在中国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如，《道德经》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对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的人文经济学需将中华文化纳入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决策。既要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又要研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更需要深刻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元素支撑了中国经济长达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等重要问题。

## 回应数智化时代关切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与社会生活方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算法推送容易形成“信息茧房”，智能鸿沟、数字鸿沟可能持续扩大，不同群体、区域在数智化进程存在接入可及性差异和接入后使用上的差异性，难以享受数字红利。人文经济学对数智化的时代关切，主要体现在数智技术驱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充分融入人文关怀与价值理念，使数据要素与文化、价值观、情感等人文要素深度融合，实现技术逻辑、人文逻辑与经济逻辑有机结合。

一方面，在技术发展中深度嵌入价值关怀，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算法设计、平台构建、应用推广都应融入人文理念，体现对人的尊重、对社会的责任。要坚持智能向善理念，完善规则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和预警机制，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有效抑制技术发展

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促进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构建符合新就业形态特征的劳动保护和保障体系，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另一方面，以数智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数字空间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共赢。数智技术是文化传承的有力工具，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播开辟了新路径。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沉浸式体验历史文化场景，关键在于如何在创新中展示文化的本真面貌和深刻意义。需关注人文精神的数字化表达与智能化服务供给，推动价值理念从系统架构层面向用户体验层面延伸，使抽象的价值在具体的数字交互与服务中变得可知、可用。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化为算法对用户情境、情感与需求的深度理解和主动响应，通过大数据精准洞察用户需求、人工智能赋能内容智能化生产，为文化产业注入创新动能，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场景。

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数智技术、人文价值与经济活动的融合，既不是传统产业数字化的简单延伸，也不是人文价值的表层附着，而是要形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经济形态，打造技术赋能、价值引领、人文浸润的经济发展生态。在这一生态中，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效率与公平、创新与规范、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实现辩证统一。唯有在数智经济发展中加强人文关怀，在技术应用中重视价值理性，在产业升级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构建既有创新活力、又充满人文温度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作者系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副校长）